

要高度重视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增收问题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easants' Income Raise in the Main Grain and Cotton Production Areas Should Be Attached

(农业部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 北京 100026)

我国人多、地少、底子薄,自古以来农业立国,现在要发挥比较优势,赶超世界强国,也要从农业起步。而我国农业实力主要集中在粮棉主产区。过去这些产区的农民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现在则增收困难,这就直接损及粮棉主产区比较优势的发挥,进而影响当地农村的稳定,对全国的经济的发展都有不利影响。

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已不仅仅是当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本身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农业和农村运行的机制和体制,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因此应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解决。

一、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的基本情况

据湖北、湖南、江西、黑龙江等粮棉主产区的调查表明,1999年上半年农民收入情况如1998年一样,增长幅度很小或是负增长。

粮棉主产区农民收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其经济状况及其所决定的农民收入结构特点有关。这些地方的农民收入结构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存在“两大两少”的特点,“两大”就是家庭经营收入和第一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两少”就是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少和劳动者报酬少。而1998年以来,特别是1999年这些地区的经济情况,对这样的收入结构必然产生进一步的重大影响。

首先是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受宏观经济形势及供求关系影响,粮、棉、油及生猪等大宗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这对主要靠出售农副产品来取得收入的主产区农民来说,影响很大。据湖北省调查,仅粮、棉、油、烟、菜、茶、猪及水产品等多种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就造成全省农民1999年上半年人均减少收入31.6元。

其次是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由于尚未完全摆脱亚洲金融风波影响,以及乡镇企业正在经历结构与体制的调整,再加上国内需求不旺、资金供给紧张,大部分粮棉主产区的乡镇企业未摆脱困难。

即使效益好的企业也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吸纳农民劳动力数量减少;而效益差的乡镇企业正在减少职工人数,进行减员增效,致使农民收入也受到影响。

再次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减少,回流增加。由于城市经济不景气,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下岗人数增多,对农民工就业形成挤压,再加上各大中城市都在整顿市容,清退临时人员,使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进一步减少,于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现象突出。如湖北省农调队1999年5月份在潜江市的典型调查,外出务工农民返回率高达60.7%。

从综合因素分析,2000年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仍不乐观。这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变化,国家陆续出台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对农村经济影响不大,如发国债及增加货币投放进行的建设项目,大部分是属于城市经济的,即使涉及农村经济的,也由于建设施工一般是机械化施工,对施工队伍资质要求高而不多用农民工。其次是农副产品供求形势不会有逆转,随着各地新出台的一系列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出台,农产品市场价格还会进一步下跌。再次,乡镇企业不景气,农民外出就业空间仍受较大限制。

二、粮棉主产区影响农民增收的突出问题

棉粮主产区农民增收面临着与全国其他地区类似的宏观经济形势偏紧、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不佳、外出务工经商机会减少等共同问题,但作为粮棉主产区来说,农民和干部反映强烈、矛盾突出、影响大的,却是以下问题。

1. 粮棉等大宗农副产品流通不畅

主产区大宗农副产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和流通不畅有很大关系。像问题十分突出的粮食和棉花,就存在着流通中的“四难”:贮存难、销售难、补贴难、收购难。

例如黑龙江地方库存粮食(含大豆)达到569亿斤,累计财务挂帐达680亿元。粮食超储财政补贴

1999年预计达到38.5亿元,其中省级补贴16.2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36%以上。再如湖北省的棉花,现库存618万担,其中有1/4因仓库已满而堆放露天。棉花销售263万担,同比少销219万担。到1998年底,全省棉花政策性亏损达22.7亿元,这还不算大量库存而销不出去的棉花所形成的潜在亏损。由于库存有限,收到棉花后不能顺价销售,企业怕亏损再增加,影响经营费用,致使收购数量大幅度减少。到1999年6月,全省共收购棉花451万担,同比减少292万担。

1999年的粮棉政策公布后,粮棉主产区的购销困难更加突出。这首先是因为各省新公布的粮棉收购价格都大幅度下调,而非粮棉主产区的财政状况好,能够及时补贴,推动了陈化粮及旧棉的销售;再加上其他地区退出保护价的粮食的降价销售,使得全国粮棉的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主产区因粮棉积压严重,财政困难,难以对销售实施补贴,使得本省粮棉企业的销售更加艰难。再加上粮棉库存中相当部分是前几年高价收购的,许多都已陈化。如湖南全省积压168亿斤粮食,其中1995年~1997年高价收购的就有110亿斤。主产区的粮棉企业和负责资金的“农发行”面对巨额亏损,“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怕承担经营责任,更不敢主动挑担了。而若不能及时销售,除了今后要承担降价损失外,还要承担超期储存利息、保管费、自然降质损失等,估计1年就会形成潜亏上百亿元。1999年秋粮和新棉上市后,不仅库存的粮棉继续形成亏损,而且占压资金、占压仓容。主产区的粮棉企业已到了难以为继、无法运行的地步。

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困难

粮棉主产区农民要想增收,农业产业结构必须调整,但调整起来也受多方面的制约,难度较大,主要难在3方面:调多少、调什么、谁来调。

先看调了多少。湖北1999年粮食播种面积为7056万亩,只比1998年调整50万亩;棉花种植面积为470万亩,比1998年调减177万亩;油料面积为1908万亩,比1998年扩大225万亩;蔬菜面积1335万亩,比1998年扩大165万亩。1999年与1998年相比,这几项农作物调整面积总计617万亩,占其播种面积的5.6%。就这让人看不起的5.6个百分点的种植面积调整,已使湖北省各级政府费了很大的劲儿,而且效果也难说。例如油料和蔬菜扩大面积、增加供给后,市场价格马上就回落,算总帐对农民增收作用不大。在转产其他经济作物没把握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选择种植原来熟悉的粮食和棉花,相对于其他的经济作物,粮棉暂时还有国家收购托底,尽管价格低,但总比其他经济作物多时一点儿也卖不出去,又不好储存要强一些。由此看,主产区农民在粮棉的产业结构调整时持谨慎态度是

有其道理的。所以粮棉主产区农民主要从事的种植业的结构调整究竟有多大的潜力,应很好地思考。

再看调了什么。正因为目前粮棉主产区进行种植业调整的幅度有限,于是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品质调优上。但这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人们推崇的优质稻,由于单产低,而且价格高、用途窄,在目前城乡居民收入预期不乐观的情况下,销路有限。而上面规定要大力压缩的早籼稻,在湖南、湖北等地就是不能“打倒”,因为其价低,“胀饭”、好消化、有利于减肥,现在许多中低收入的消费者特愿意买。而且又适于加工成米粉等食品,国外市场也有需求。此外大江大湖附近的农民从避灾保生活出发,也要在汛前种早籼稻。现在上面规定早籼稻要退出保护价,但又不放开市场,农民认为这是“让离婚但又不许嫁人”,意见很大。再如优质果瓜蔬菜,虽是一时颇显紧俏,但大家都上,供应量多了,也会销售困难。我们在长江流域调查,行程千里,一路上见到的西瓜品质都比前几年的好,但上市量仅比1998年大了一些,价格则跌了一半以上,许多地方才5分钱1斤,瓜农叫苦不迭。

最后看看由谁来调。现在对粮棉主产区农民调结构的意愿和能力的判断有分歧。很多干部认为单靠农民自发地调结构,调不准,来得慢,不能有效地占领市场,于是就亲自出面直接指挥农民调结构。从个别地方早期调结构的情况看,是出过一些暂时成功的典型,但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同时调结构时,这种由于干部来当调整结构的主力,指挥农民调结构的做法就显出很多弊端,如强迫命令、结构趋同、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产品容易烂市、增加农民负担等纷纷出现。我们调查的几个省,就发现很多乡村都在搞瓜果菜等相同产业,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从全省或全国范围来看也缺乏地方特色,今后的市场前景令人担忧。

3. 农业科教体系不活

从调查情况看,能打开市场,确实能给农民增加收入的产品和产业都具有科技含量;当前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迫切需要科技教育体系来支撑。但遗憾的是现在的农业科教体系十分不适应当前的形势。我们在农村调查的所有的农民增收的具体典型中,农民都认为他们的科技知识不是从现存的如农科院、农业院校或技术推广站等官办的科教体系中得到的,反而很多事例都证明是农民走在这些单位的前面。那么农业科教体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有本事的专家呢?也不是。闻名全世界的BT(苏云金芽孢杆菌,属微生物农药)就是湖北农业科技推广单位的专家搞出来的,但当这些专家要与民营企业联合,扩大BT的产业化经营时,就遭到湖北农科院的某些人采取种种手法的反对,甚至以“不报国家工程院院士”相威胁。

农村教育的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农村实现 9 年义务教育,办学经费大部分却要由农民负担,教师几乎全部由县乡财政养着,吃大锅饭,没有多少教学积极性,教材也不适合农村特点,农民的孩子在家长的全力支持下读完 9 年书,也对自家务农起不了多大作用。而要再念中专、大学,则学费更高。现在县及县以下的农业科技教单位中很多非专业人员占据编制,人满为患,农民的子弟即使上了中专或大学,再有本事,但没关系也进不去。基于这种情况,现在许多农民视教育为压在头上的大山,开始不让孩子读书,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农民负担重的地方。于是湖南、湖北、河南等许多地方就用法律的办法来强制。但这只能解决一时一事,而且会引起农民更大的反感。

4. 农村金融形势严峻

长期以来,粮棉主产区的农村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国营合作商业系统收购粮棉,因逐年沉淀,压死了;另外就是相当一部分用于办乡镇企业。但这些地区缺乏人才,不能从市场出发来经营,在宏观形势变化和其他地方企业的竞争下,纷纷倒闭,也形成了不少坏帐。问题积累到现在,主产区的金融形势已十分严峻。像我们调查的没有遭受洪灾、经济情况较好的襄樊 8 个县市的金融机构,截止到 1999 年 6 月底,全市各金融机构累计亏损 21 亿元,不良资产率达到 53.5%,上半年新增亏损 4.05 亿元。湖北全省各金融机构的情况比襄樊市要差,所以绝大多数机构都是靠居民每年新增的储蓄存款来保开门营业,应付储户提款等支付业务,另外就是把新增存款放出去收利息来保职工的工资,一句话,就是完全靠新增存款来维持。

正是这种经营状况,使得所有金融机构只能是拼命吸收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存款,而无力向城市和农村发放相应的贷款。1999 年 1~5 月份,湖北全省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净投放贷款 20 亿元,同比下降 50 多亿元。做为农村金融的主渠道的湖北省农业银行,截止到 1999 年 6 月,农业贷款为 366 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为 59%,实际上占不到这个比例,因为过去占压资金已达农业贷款的 65%,而且这两年实有的农业贷款中相当部分是由“农发行”划转过来的扶贫资金。1998 年湖北农村受灾严重,农村信用社利息收入比上年减少 3.8 亿元,比 1997 年增亏 17.7 亿元。据我们在各县调查,许多地方的信用社的存款都是下降的。由于存款下降,很多地方的信用社保不了正常支付,出现了挤兑现象。就是一些情况较好地区的信用社,1999 年上半年对农村投放贷款的相当部分也是来源于中央银行当年下拨的 150 亿元支农资金。

粮棉主产区过去为解决农村资金紧张,也办了不少农村合作基金会,目前都在整顿,发现不良资

产率很高,一些乡镇已出现挤兑。各地采取一把手总负责,有牵连的干部“双停”(停工作、停工资去催款,催不回就下岗),欠债人找担保,抵提留、税收和往来欠款以及法院强制执行追款等措施,全力追讨“农合金”放出的农民的血汗钱。对于“农合金”整顿,农村信用社有很大担忧,怕像前些时候“农发行”的经营性贷款业务转到农业银行时那样(双方对转移的资产质量的看法不同),合并、转移到信用社的“农合金”的资产质量差,以至继续加大农村信用社的金融风险。

5. 农民负担不轻

在主产区实地调查时,从当地要出的农民负担登记卡看,人均负担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畜禽防疫费、经审批的教育集资、水费、水利发展基金、合同鉴证费、共同生产费、农业综合开发有偿回收资金等各种名目负担,已占 1998 年全县人均纯收入的 10% 以上。这还不算负担卡以外的乡镇摊派的书报费等其他费用。另外农民反映多的就是修堤等要出大量义务工。此外当前主产区的农民负担还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统计数字不实。各地的关于农民收入的统计数字主要来源于当地的统计局和农口的经营管理站系统。但这两套系统的统计调查方法陈旧,实物现金一起算,再加上层层领导出于政绩考虑要反复敲定数字,使得最终公布的结果很难反映农民真实的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的情况。像我们调查的许多县因受灾等原因,农民的储蓄存款实际上都在减少,而这些县“统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都依然像往年一样,只增不减。由此统计数字再按比例反推出农民上交的“三提五统”等费用,肯定会增加农民负担。

二是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无法据实征收。因为家庭承包经营后,每户农户的地块多且分散,从事的多种经营也经常变化,购销、加工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现行的各种统计调查系统无法查清、核实。但由于这些税收费属于地方,特别是由县、乡两级干部使用,于是他们就采取以农业部门上报的生产数字(也要考虑政绩)来折算税收总额,然后分解摊派下去。这些税收负担都在“三提五统”等人均纯收入 5% 的比例之外,上面检查用的“高压线”(5%)管不着,而且也无从查实,干部可以随便增加,纷纷从这些税收上打农民的主意。例如 1998 年湖北省的农业特产税是 1993 年的 6.4 倍,屠宰税是 1993 年的 19.2 倍,而 1998 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现价)即使按不实的统计也仅是 1993 年的两三倍。如果加上其他环节征收的税费,农民的负担就更重了。

三是庞大的村组干部花掉农民负担的一大块。主产区除了尽人皆知的乡镇、县及县以上各类机构庞杂、人员多,以至增加农民负担外,村组一级

的干部多、补贴高也成为一大隐忧。据省人事编制部门调查,荆州市总人口 630 万人,村级干部、村民小组长,还有村级的广播通讯、水利、公路维护、电气管理等服务人员,村民小组中各类服务人员等,总数 63 685 人,都拿工资补贴,平均每村负担 22 人。基本上把农民上交的村提留(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2.5%,“三提五统”的 60%)分光。这还不算这些村组干部的吃喝、拿要等行为形成的农民负担。

四是现在试行的税费大包干等税费改革办法难以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从各地调查的情况可看出,农民负担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若没有综合性、根本性的考虑,仅靠一些地方实行的税费大包干等办法是不行的。因为这些试点地区的办法,都是把原来该收或不该收的税费等捆在一起,用各种规定固定下来,这样就使包干的基数过高,而且一旦固定,根据以往的情况,农民负担就以此为最低线而逐年向上递增。另外由于没从体制与机制上改变农民负担的外部环境和计征方式,于是大包干式的税费改革一旦在面上铺开,绝对不会像试点时那样能“包死”负担,包干以外的各种摊派、索要依然会滋生出来。

从以上 5 方面影响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的问题来看,当前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不仅仅是市场问题、生产问题,而且更有许多深层的政策体制问题。改革开放后,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有了经营自主权,当时粮棉处于短缺状态,于是在国家提价的收购政策激励下,农民努力生产,从而增加了收入。现在主产区的农民仍在怀念 80 年代。随着农民越过温饱线后粮棉市场的反复变化,国家对粮棉主产区的政策也在变化。过去变化的主线仍把主产区做为国家需要的战略性物资的生产基地来看,由此采取各种办法强化了主产区在大宗农副产品的贸易、加工、科技及金融等方面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保证这些体制运行的各类机构,增加了许多吃财政饭的履行计划职能的人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棉主产区的这套体制及管理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且其运行成本高昂,亏损严重,直接增加农民负担,财政也不堪重负。这一切现在都集中表现在农民收入上,因为它是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状况的最综合、最直接、最准确的指标。由各地的调查情况可以看出,当前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难,不是难在农户自身上,而是难在农户的外部环境,主要是难在贸易、科教、金融、税费及组织机构等方面的政策、体制环境上。是这些制度性的因素,在制约着广大农户为增加收入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三、关于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1. 要对主产区农民增收形势有清醒的判断

在现在全国进行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粮棉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始终是个大问题。若粮棉主产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误,使大宗农副产品的供给背离市场要求,那么全国的农产品供求形势就会反转,这样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政策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要使主产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适当,主要靠当地农民对现金收入的追求中产生的适应市场供求的经营行为。重视主产区的农民增收,以此为主线来调整结构,就会使主产区的农业生产的机制和体制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这对于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新阶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粮棉主产区农民要增加现金收入,就需要农业生产对路,产品能卖出好价钱。这对于一贯重视实物生产,而流通却受到政策体制制约的粮棉主产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需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因此对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增收不能着急。要深入认识农民收入的实质,建立准确的农民收入监测体系,重视现金收入的增长,主要做好确立农户的主体地位;保护并调动其经营的积极性、创造性;深化贸易、科技、金融、税费等方面的改革;从政策、制度上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等基础性工作,用几年的时间进行农民增收的机制、体制的调整,而不是搞一些只管一时一事的“短平快”的政绩工程。这样一旦农户外部环境理顺,待宏观形势变化,主产区面临的市场情况变好时,这里的农户就会乘势而上,通过发挥自己勤俭、钻研,以及精耕细作等特点,向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

2. 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来促进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

正是基于以上对粮棉主产区农民增收形势的判断,所以在具体运作时要格外注意用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方式来促进当地农民增收。

首先是尊重广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他们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的作用,让他们在市场中选择增收的途径和方法,自主确定调多少、怎么调等结构调整中的具体经营问题。

其次要充分发挥在市场拼搏中涌现出来的农村中的能人、大户及企业家的示范带动作用。他们是在粮棉主产区经济结构调整中最具实力与经验,也是最有希望的主体。由他们通过各种产业化经营的方式来率领广大农民闯市场,是当地群众看得见、学得了的增加收入的现实办法。特别是那些从事粮棉等大宗农副产品加工的民营企业,随着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那么像粮食、棉花这些过去看来似乎没有希望的产业也会重新振兴起来。

再次是发育产品市场的同时要格外注重培育要素市场,使土地、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生产要素在能人、大户和企业家的配置下,大范围地流动起来,分化与重组,形成新的聚集,特别是沿着市场体系的网络,形成相互衔接的社会分工组织,构建企业,进而形成城镇。这种超越农业产业,向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发展的态势的形成,则是主产区农民增收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

3. 政府要为主产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

过去政府对粮棉主产区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用种种政策与制度,把当地的农民管住,束缚了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直接影响其收入的增加。今后要使农民增收,就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着力于政策供给与体制创新,使主产区的农民有宽松的外部环境,通过他们在市场中的自主经营来增收。

(1) 农产品贸易政策 现在粮棉等大宗农产品放开价格、但不放开市场的做法应该马上改进,近期现实的途径就是放宽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认定标准,不论大型,还是中小型的龙头企业,只要能和主产区农民平等交换,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就应允许其直接收购农民的粮棉产品,并允许其加工经营。此外对粮棉企业的顺价销售政策应做调整,应在给予其经销粮棉的自主权的同时,把相应的风险与责任也压在企业及其负责人身上,使其与政府共同分忧,尽快把购销的粮棉合理地销售出去。原有的陈粮旧棉要在粮食、供销社、农业、“农发行”、技术监督等各部门的有效监督和配合下,通过在市场上竞标拍卖的方式,尽快销售,以便把目前粮棉购销的死棋走活。在今后调整粮棉政策时,内外贸要一起考虑,改革我国农副产品的内外贸分割的体制,赋予尽可能多的农副产品加工及经销企业以自营进出口权,提高农副产品出口的退税率,同时抓住适当时机调整汇率,使我国的主要农副产品重获比较优势,在国家的协助下走向国际市场。这是近期缓解国内库存压力,中长期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力措施。

(2) 农业结构调整政策 首先要把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自主权真正交给农民,由他们根据市场情况来合理配置自家的各种资源。广大农户自主调结构,信息充分,收益与风险对称,能适应农村的区域性市场以及十分不平衡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且农户要保自家的粮食安全,可以从微观上较好地解决宏观经济中的粮经比例等结构调整中的难题。

其次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粮棉主产区的结构调整、发挥优势、防止重复建设,有赖于市场体系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要广开主产区农民进入市场、进行农产品流通的渠道,发育各种中介组织,清除各种关卡和乱收费、乱罚款现象,改变生猪屠宰“一把

刀”的做法,加强产地批发市场建设,并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农产品储运、加工、分收分类、包装等产业环节的延伸。

再次,各级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准确定位,不要就调多少、调什么等具体的生产经营问题指手划脚,搞行政干预、强迫命令和“一刀切”;要把注意力转到市场的调研与开拓、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发布及提供科技成果以供农民自主选择等方面来。

(3) 农业科教政策 首先要抓高产优质高效的种植业、养殖业的种苗,进行攻关和引进,并采取有效措施,提出能促进主产区农民增收的农业实用生产、加工技术,进行示范与推广。

其次要深化农业科教体制改革。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的是社会公益性的,但也要打破“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要讲求学术规范,停止评职称,采取聘任制;事业单位进入要经过省一级统一考试,真正放活人才;事业费要与项目成果挂钩,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放开的是经营服务型的,要做为经营主体来对待,并区分不同单位情况,逐渐将其推向市场,促使其将农业科技与教育做为产业来经营。与此同时,要采取优惠的税收、信贷、土地经营等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农业科研与教育,通过有效竞争来促进农业科教事业的发展,真正为农村基层服务,为广大农民服务。

(4) 金融政策 要高度重视粮棉主产区严峻的金融形势,采取适当措施,如中央银行对粮棉主产区增发专项支农贷款,支持主产区组织农业产业基金上市,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上市及发债券等有效措施,以帮助主产区农民在调整结构、增加收入时获得资金支持。此外还要采取果断措施,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首先,“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职能应随着粮棉购销政策的调整而相应调整,主要应负责中央政府的粮、棉等大宗农副产品的专项储备及农村产业、区域性政策实施的有关资金。

其次,农业银行做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要加大力度。可以考虑将其拆为3个银行,其中一两个拿出来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形成竞争局面,促使其在农村金融领域中有效率地经营。

再次,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要深化,真正还权于农民,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办成真正的农民合作金融组织。

最后,允许主产区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办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并保护农村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以满足农村不同地方、不同层次的农民对金融服务的不同需求,有效地盘活农村资金。

(5) 农民负担政策。对于农民负担问题要标本兼治,既要出台一些立即见效的措施,也要考虑中长期的政策设计,消除农村基层存在的减收增负、

作物智能栽培学: 信息科学与作物栽培学的结合

Intelligent Crop Culture: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Crop Culture Science

曹卫星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部作物生长调控重点开放实验室, 主任、教授 南京 210095)

作物栽培学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探索通过栽培管理、生长调控、优化决策等途径, 实现作物高产、优质、高效及其可持续性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科学。作物生产是农业生产的核心, 维系着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 因此深入研究作物栽培学的发展特点, 正确把握其发展方向, 对于促进作物栽培学的不断更新和持续发展、建立现代农业科技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技术是研究信息的产生、采集、存储、交换、传递、处理及利用的高新科技。随着计算机、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 信息技术正在对社会、经济和生活环境产生强大和深远的影响。农业信息技术正是在信息科学和农业科学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领域。作物智能栽培

学则是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成功典范。

一、作物智能栽培学的形成和定义

中国特色的作物栽培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变革与拓展, 逐步渗入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 其研究内容和手段都得到了重大的更新和提高。现代作物栽培学不仅注重作物高产理论与技术, 同时注重作物生产的高效管理及持续发展。当今的作物栽培学体系主要涵盖作物生理学、作物生态学、作物管理学3个相互联系的学科领域, 又分别以作物产量生理、环境生理、技术原理为理论基础, 以技术—环境—产量的动态关系为生长调控主线, 以高产高效优质的作物生产为主要目标。作物栽培学一方面应用植物生理和生态的方法与技术, 围绕作物生产上急需解

引发农民不满、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隐患。

首先是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和生猪屠宰税。目前这两税既不能像初始设计的那样“取之于农, 用之于农”, 又无法按实征收, 直接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农民意见很大, 说:“谁取消这两税, 我们喊谁万岁!”在当前国家调整粮棉烟糖蚕茧等政策, 增加了农民减收因素的时候, 取消这两税, 是对全国大多数农民, 特别是对粮棉主产区的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帮助。

其次, 结合村民自治工作, 将原来按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定期征收的“村提留”, 改为按村里民主议定的公益性服务项目临时收费; 干了事, 有服务就收; 不干事, 没服务或服务不好就不能收。收取的时间、数额、方式、用法由村民自治组织民主决定, 成效也由其检查。村组干部民主选举, 控制职数, 义务兼职; 必须少量补贴的, 也要经村民开会民主决定。

再次, 将村民自治扩大到乡镇一级, 乡镇主要领导由所在地区农民直接选举产生。乡镇不搞实体财政, 变成县的派出性质的机构, 只设民政、公安、

财税、计划生育、经济等少数专职助理(是吃县财政饭的公务员), 同时撤掉建在乡级的各种站所, 其原来公益性职能由县级机构承担, 其原来的经营服务性职能由民间发育的合作社、农民协会及公司等各类组织运作。原来上收的“乡统筹”(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 “三提五统”的40%), 参照“村提留”的改进办法, 也改为公益性服务项目的临时收费, 收费的时间、数额、方式、用途在村民自治组织同意的基础上, 由乡级自治组织民主议定, 成效也由这两级自治组织共同检查。

最后, 理清农村税费关系。农业税可按田亩状况划分等级后分类征收, 总规模不要扩大, 由县、乡的财税干部负责实施。其它各种收费、摊派、集资, 都应视为非法。要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农民经济权益保护法》, 其核心是采取法律措施, 来鼓励农民作为主体起来捍卫自己的经济权益。如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作出凡是加重农民负担者“取一退三”(即按照向农民非法索取金额的3倍来退赔)和有关农民负担的诉讼先不收费的法律规定。

(责任编辑 王宏章)